

党 史 纵 横

1993 年 度
合 订 本

《党史纵横》编辑部

党史纵横

1993年1月《党史纵横》第1期总第83期（月刊）

丰碑，与日月同辉——周恩来纪念馆修建始末
宋庆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我的父亲任国桢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交往

东北暖风吹宝岛



终生康健何处求 延生护宝解君愁



神奇的延生护宝液，集养生、补益、治疗为一体，具有见效迅速、疗效可靠、作用持久、无副作用的特点。主要作用为：

- 1、补肾壮阳，主治阳痿、成熟女性性冷漠；
- 2、对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有奇特疗效；
- 3、对男性不育症及女性白带过多等症有较好的疗效；
- 4、对阳虚体寒、腰膝酸痛、风寒腰腿痛、手脚发凉等症有较好治疗作用；
- 5、通和血脉，对冠心病、脉管炎等症有疗效；
- 6、有促进骨髓造血的作用，对功能性贫血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 7、能使头发光润，白发变黑，增强皮肤弹性，减少皱纹，抵抗衰老。
- 8、对老花眼有较好疗效。

中外合资

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

辽卫药健字：90Z-19号

注册商标：虎睛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96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392256-963

一次特殊的评刊会

——首都老文艺工作者喜爱《党史纵横》

· 丁 帆 ·

去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晋察冀文艺史料展览在北京开幕。原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文艺学院戏剧系一、二班老同学在戏剧学院相聚。因为《党史纵横》以前曾先后发表过《一次特殊的演出》、《怀念华北联大老校长成仿吾》、《〈白毛女〉北平首次演出前后》等有关回忆文章,所以,会议期间,《党史纵横》杂志本身,也自然地成了这些老同志的一个热门话题。

本刊特邀记者丁帆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将有关记录整理成文,现刊发,以饕读者。

《党史纵横》杂志宣传得很不够。一些与会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学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本刊物。加之,所带数量有限,但大家翻阅、传阅之后,大为惊异,称赞不止。

张庚同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我是第一次看《党史纵横》,这么好的一本杂志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以前,没有人向我介绍,所以印象纯如白纸,没有任何成见。送我几册,基本上都看了几篇,尽管我视力不好,很费劲,不能全看,但觉得内中历史资料丰富多彩,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知识性也很强,图文并茂,很令人喜欢。”

“我很愿意看其中对革命战争的描写,非常有可读性;它不枯燥,不板面孔,枯燥起来是没法读下去的。这个刊物办得有点,是不错的。”

舒强同志(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我看的杂志多一些,在有关党史方面的我是第一次看《党史纵横》,从刊名上

讲,相似于全国政协编的那本《纵横》,那是一册范围广泛,史料丰富的刊物。而《党史纵横》也相当有水平,也是一本很不错的刊物,我很感兴趣。”

“党史本身容易枯燥无味,而这本刊物里边有很多重要文章,都是些仁人志士与共产党合作的光辉事迹,编的不错,不是一般的文章,很感人。其中有些文章,过去人们不知道,应该让人知道,发表出来就很有意义。如《雨花台的情思——忆石璞烈士牺牲的前前后后》一文便引起我许多回忆。石璞是被国民党枪杀的,死时才17岁。那时我年纪小,只有12岁。但石璞和我舅父的交往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给舅父的多封来信,我看过,是非常进步的,对我参加革命颇有影响。”

“《党史纵横》这本刊物对我很亲切,大部分文章我看过后,感到很吸引人,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史实真实生动,很有说服力。《党史纵横》确是一本很不错的刊物。”

杨子江同志(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出版部主任高级编辑)“在当前杂志出版纷杂的情况下,充得上上乘的杂志,就是说无论从内容(这是主要的)到封面、编排,包括版式设计……特别是它的史料性、知识性、教育性、可读性等,《党史纵横》这本刊物可以说还是很不错的,好就好在——第一正:内容思想健康,正派不邪;第二实:充实、实在、不虚。其中很多文章都很难得,比较真实,也很珍贵。”

“办好一本党史刊物,很不容易。为了更上一层楼,我建议,可否开辟栏目,组织大、中学生(包括青少年)开展党史讨论,使他们对党史有所了解,不忘前辈创业之艰辛,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以社会知识和社会服务的精神来教育青少年。现在青少年

对党史感兴趣的,甚至有许多糊涂思想,要现身说法吸引他们,提高他们的认识 and 兴趣。”

前民(中国音乐学院一级演员)马琦(中央戏剧学院原文系副主任、副教授)张奇虹(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一级导演)梁化群(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等同志先后谈了对这本杂志的感想。他们说:

——看了《党史纵横》这本刊物后,一致感到异常亲切,如《“白毛女”北平首次演出前后》这篇回忆文章,当时我们都是参加者,事情经过很不平常,今天回忆起来更使人激动,将近半个世纪了,一切恍如昨日,实际已成史实,其中很多资料都是很珍贵的。的确这是本具有可读性的生动教材,而且又有保存价值,是一本非常好的刊物,遗憾的是过去我们对它一点也不了解。

——《党史纵横》中的文章所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并不只限于东北辽宁地区,全国都包括了,这样,从内容上较为丰富,学术性、知识性也很强;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

——有些文章和照片都非常难得,珍贵而有价值。有的事我们听说过,但其说法不一,看了文章后泾渭分明,疑难顿消,深受教益。

与会的老同志充分肯定了编辑们的辛勤劳动,他们十分感谢编辑部的同志们为社会提供了这样一份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并热切地祝愿《党史纵横》越办越好。张庚同志还欣然为本刊题了词:“普及党史知识的好读物。”(见本期第13页)

· 专 稿 ·

党史纵横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主办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1988年创刊(月刊)1993年1月10日出版总第83期

本刊专稿 扉页 一次特殊的评刊会

——首都老文艺工作者喜爱《党史纵横》 丁帆

华夏壮歌 4 丰碑,与日月同辉

——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始末 秦九凤

往事珍闻 11 临危不惧,指挥若定

——忆崂山遇险中的周恩来 向三志

20 幸存者的思念

——我记忆中的崂山遇险 陈贤仁

域中轶事 12 乡情与乡戏

——周总理三看绍剧 赵玲华 余一苗

风范长存

8

中山精神擎旗人

——宋庆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金英豪

40

共产党人的情怀

——领袖父子对家亲 刘斌珍 文辉抗

怀念前贤

32

我心中的灯塔

——怀念父亲任国桢 任为

34

东北暖风吹宝岛

——忆先翁高崇民 白克凡

国际轶事

21

魏金斯基中国行 杨尧深

23

西柏坡会谈之亲历 柯瓦廖夫回忆 阎文滨编译

43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功过 赵照盛

22

风琴一曲解兵危 姜凤林



封面题字 彭真

顾问 伍修权 冯文彬 李锐

陈野苹 李涛 尚文

徐文才 罗定枫 张凌云

于均波 陈济安 张传庆

王永年 董吉昶 李清霖

编委会主任 冯树成

副主任 李光明 谭译 高巨

编委 肖瑞武 王启国 高东旭

陈守信 何新德 陈英

王启湘 戈福录 刘颖平

王力文 纪凤国

革命情谊

38

深情,从延安一出短剧开始

——毛泽东与刘谦初一家 张升善 陈德山

17

风雨同舟

——周恩来与廖仲恺一家两代人的友谊 蒙光勋

15

知音

——周恩来与郭沫若的交往 许虔东

英烈千古

36

正气千秋

——苗可秀烈士的两封遗书 吴宝春

42

血洒台湾的人民功臣刘天祥 雷明义

48

墓碑前的团圆 李红军



史海钩沉

26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诞生记 李波

29

革命战争时期的远大目光

——中国共产党与出海口计划 蓝振露

28

一隅海门悲欢史

——葫芦岛港兴建通航始末 李勤

27

“第一枚毛泽东像章”又有新发现 李池

历史一页

24

起义后的风波

——“石人车站”叛乱事件亲历记 于寰海

14

枯木逢春

——周总理关心满文遗产 任世铎 佟永功

31

周蒋对弈 黄子云

航空忆话

46

云中七彩路

——忆开辟北京——拉萨空中航线 刘长祥

编读往来

13

张庚同志为本刊题词

23

重要更正一则 本刊

35

本刊敬告两则 本刊



编辑出版 《党史纵横》编辑部

主 编 高 巨

副 主 编 王启国 戈福录

本期责编 高 巨

总体设计 晓 星

封面摄影 洪 华

本刊地址 沈阳市北陵大街45号(110032)

国际刊号 ISSN1003-8361

国内刊号 CN21-1255/D

广告经营证号 辽工商广字01-179

承 印 辽宁省公安厅第二印刷厂

发 行 本刊自办发行,常年办理邮购。

丰碑，与日月同辉

——周恩来纪念馆筹建始末



江苏淮安北门外，人们右前方的视野里是一片开阔的水面，碧波荡漾中一座方形的高大建筑物拔地而起，在青松绿水映衬下显得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这就是举世瞩目的周恩来纪念馆。

延安的一位老农深情地请求说：“你们得想办法给周总理也建个纪念馆，他可是给中国人民扛了一辈子长工啊！”

周总理为国为民操劳一生，功高盖世，临终时连一屑骨灰都不保存，他向人民献出了全部爱心，人民怎会忘记他。

1976年的4月4日，京城寒意未尽。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贴出了一份署名“边疆某部部分战士”的倡议书：建议由人民群众自愿捐款集资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建立一座纪念馆。人们争先围观着，许多人流着眼泪，纷纷解囊。瞬间，所捐钱币便堆成了一座小山。此事在成千上万人的心扉里留下深沉的

撞击声：一定要给周总理建一个永久的纪念馆！

1980年秋，延安地区的一位老农对前往访问的周恩来生前卫士韩福裕同志说：“你们得想办法给周总理也建个纪念馆，他可是给毛主席、给中国人民扛了一辈子长工啊！”老农那朴实的语言使老韩动情地落泪了。他默默地连连点头。

1985年，兰州军区司令员杜义德将军来到淮安周恩来故居。在总理铜象前，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久久肃立，热泪潸然。到接待室，将军深情未消，问故居管理处的王树荣主任：“淮安有周恩来纪念馆么？”当他听到回答说没有时，老将军激动了，他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把他那指挥千军万马的大手一挥：“赶快建！要是没钱，我给你们去捐！”也是那一年，江苏省原副省长管文蔚同志来到周恩来故居。他一边参观，一边低声吟诵：“古今雄杰若鳞比，能有几人似周君？”望着摩肩接踵的人流，老人动情地说：“淮安是周总理的故乡，要建个

● 秦九凤 ●

周恩来纪念馆，一定要建！”

人民的意愿犹如阵阵海潮，一阵又一阵地撞击着人们的心扉。

第二任中央领导人见到请示报告，连声说行。果断的决策，终于遂了亿万人民的心愿。

为周恩来建纪念馆，淮安人当然不会落后，淮阴、江苏的领导人都积极行动，要求建馆的报告层层上转，最后送到了当时党中央领导的手里。他几经考虑，批给了邓颖超同志阅处。答案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但是，只要人民的心愿没有了却，人民就不会忘却。一段时间的沉默过后，新的报告很快又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手中。这已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任党中央领导人。新的中央领导人见到中宣部的请示报告，连声说行，甚至说，用不着开会讨论了，这是一件好事，随即不加思索地提笔批道：“可以吧。规模不很大，资金也有限。不必再送常委了。”这几句干脆利索的话，代表了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198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86)47号《关于建立周恩来同志纪念馆的复函》。这是中央以文件的形式批准在周恩来的故乡江苏省淮安市建设周恩来同志纪念馆。中宣部的复函说：“同意在淮安建立周恩来同志纪念馆。建馆要注意朴实，并注意与故居的环境风貌相协调，讲究宣传实效，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不久，江苏省委就收到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馆名——“周恩来纪念馆”。六个大字苍劲有力，凝聚着两位伟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想总理之所想，寓总理与人民的鱼水关系，馆址选在四周环水的桃花垠。

中央同意在淮安建周恩来纪念馆了！消息不脛而走。这个馆建在什么地方好呢？专家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四、五个方案。

第一方案，把纪念馆建在周恩来诞生地驸马巷故居旁边。好处是，游人可以在同一地方既参观故居又参观纪念馆，十分方便。可是，这里地处闹市区，地方太小，拆迁又多，而且建成后无法容纳海内外接踵而至的千千万万参观者。

第二方案是把馆建在周恩来小时常去游玩的勺湖边。这里风景优美，离故居只有几百米远，西傍风光旖旎的勺湖，北临设备一流的淮安宾馆，位置很好。不过，此举要动迁一个拥有400多名工人、年产值上千万元的淮安化工厂。为周恩来建纪念馆而迁走一座工厂，总有些让人感到不安。于是，专家们又把目光集中到淮安城的市中心。这里比较开阔，原是元、明、清三朝的漕运总督部院所在，整个地面要比淮安城其他地方高出1米，又处在城市中轴线上，建馆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但是，

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块地方建国后一直是淮安人民体育场。周恩来一生只为人民，从不为自己。如果把他的纪念馆建在淮安这样一块“黄金宝地”上，挤掉体育场，周总理的英灵难安啊！就这样，第三方案又被人们忍痛割舍了。此后，还有人提出府学魁星楼旧址等地方，都因为与上述几套方案中的类似原因而被否定了。

“我看建在城东北的桃花垠！你们看，这里有宽阔的水面，体现着周总理与人民的鱼水之情；这里大部分是荒地沼泽，不动迁什么民房，又不占用多少良田沃土；这里离故居不远，由文渠一水相牵……”发言的这位是苏州市规划局的专家喻绳芳。随着他的精辟论证，专家们的目光一齐被他吸引到桃花垠这块地方。淮安的同志补充说，不错，早在宋、元年间，“桃花垠水”就已是淮安的“十八风景”之一，从明代起这里才逐渐荒芜，现在只长有芦柴、蒲草，农田也很少，有利于规划设计，建国后这里曾一度作为一个公园的规划区……

大家一致认为在这里建馆好。

周恩来纪念馆建在桃花垠！消息象长上了翅膀，飞向祖国的天南海北，桃花垠的名字也伴随着周恩来纪念馆传向了五洲四洋。

整个设计突出了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主馆大门象“周”字，屋顶似“公”字，四根巨大花岗石柱，象征着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

1988年初，周恩来纪念馆筹备委员会把设计任务交给了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东南大学。教授们开动脑筋，率先设计出七套方案，各有千秋。就在人们纷纷议论之时，一位花白头发的老者站起身来，他在指出这些方案中的优点之后提出了他自己的建馆设想。这位才思敏捷的老专家，当场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

四坡屋顶形的建筑。于是，周恩来纪念馆建筑设计方案的天平渐渐地向这位老专家倾斜。他叫齐康，是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杨廷宝的得意门生，东南大学建筑设计学教授，他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等著名建筑物的设计。

齐康教授在整个建筑设计中，既考虑了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又注意吸取当代建筑的先进技术。他把主馆设计在梯形四坡绿色草坪基台上，并配以四坡屋顶，这既象征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永远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也酷似古埃及那万世永存的金字塔。主馆大门象“周”、屋顶酷似“公”，其寓意不言自明。特别是那四根11米高的巨大花岗石柱，宛若擎天大树，象征着周恩来生前四次提出、并为之奋斗终生的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而更深的含义也蕴含在齐康教授的设计之中：四坡屋顶、四根柱子的造型活象苏北里下河地区的牛车棚和待渡亭。周恩来为国为民操劳一辈子，甘当人民的老黄牛，整整为人民“拉”了一辈子的车；1910年周恩来离家从运河边的待渡亭登舟扬帆远去，如今，他又回到了淮安的“待渡亭”，以让他“魂归故里”。

位于主馆北侧的附馆是“人”字形。那张开的两笔自然伸向主馆，似若拱卫之状。其中深含着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的寓意。在附馆前边，还有一座方形的牌楼门，它起着主、附馆连接作用。从飞机上鸟瞰，附馆又象个“八”，牌楼象个“一”，含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之意。馆区的建筑色彩也颇为讲究，白的墙壁、青色花岗岩外贴面，青灰水泥铺地砖……整个馆区，青白两色。从外表上看既显得简洁明快，又显示出美观大方，内涵周总理位居极品、两袖清风，一生清清白白的意思。周恩来纪念馆作为一座千秋万代的纪念性建筑，建筑

设计大师齐康教授的创作可堪称是匠心独运的杰作。

奠基庆典时，邓颖超同志发来电报，并委派总理生前秘书连夜赶到，代转自己对淮安人民的深情。

1988年的3月5日，沉睡数百年之久的桃花垠被雄壮的《国际歌》和那撼天摇地的鞭炮声震醒了。

清水环绕的桃花垠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一座长约二十米、高六米的巨大松屏横亘于纪念岛上，一朵朵洁白的小花点缀在散发幽香的松枝间。周恩来的大幅遗像高高镶嵌在青松白花之间，他，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周恩来纪念馆奠基典礼”十个金色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庄严夺目。邓小平同志手书的“周恩来纪念馆”横幅放在会场的正中前方。淮安市各界代表、中外宾客共1000多人肃立在周恩来的遗像前。

敬爱的邓大姐在接到邀请参加奠基典礼的电报后，因身体条件不允许，未能如愿，但她深情地回了一封电报。并委派周恩来生前秘书高振普同志连夜赶到淮安。作为邓颖超的代表，向一直关心着她和恩来同志的家乡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培土奠基的人群中，除了各级领导人之外，还有周恩来的侄儿、侄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和、周尔辉和周尔萃等以及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女士等。

特殊的工作造就了特殊的人才。人人都在为它的顺利建成、开馆加倍地做着奉献，以不同的方式寄托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

承担主体工程建筑的江苏省建筑公司，决定把这项工程当作教育新一代建筑工人的最好场所。公司派出了一流工程队。

1988年才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方道生怎么也想不到会让他来担任这一重要工程的施工员。一

时间，他整夜无法入睡。是啊，他听过多少周总理爱人民的故事。特别是小学四年级读的《十里长街送总理》那一课，至今他仍能倒背如流，而且每背起来总是泪水盈盈。如今，自己就将担负起周总理纪念馆的施工任务，工程的技术要求，各种数据都得靠自己把关……每到夜深人静，小方就轻手轻脚钻进设计室，面对一份份图纸，捉摸着施工方案，思考着搞出更合理的钢筋、模板的组合。半个多月后，主体工程的两万多个数据，他终于能一一背出，丝毫不差，被工人们誉为“活电脑”。由于小方整天在钢筋缝里钻、脚手架上爬，1990年到1991年的一年时间内，他就冲破8双胶底旅游鞋，但他的腋下从不带一份图纸。由于他的模范事迹，被共青团江苏省委授予1991年的“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

搞了40年建筑的老工人杨炳峰，忘不了周总理对建筑工人的关怀、爱护。1990年1月办了退休手续后，面对一家建筑单位400元月补贴的聘请和其他优惠待遇不屑一顾，毅然坚持上纪念馆工地，负责抓质量和工地安全。春节期间，老伴和儿女们望着他消瘦的面庞，都很心疼，他却自豪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建筑，在花甲之年还能赶上建周总理纪念馆，值得啊！”

奠基仪式过后，纪念馆史料征集工作与土建工程同步进行。

在北京西黄城根南街，征集组的同志找到了一位年逾花甲、体格健壮的老人。他叫韩福裕，是周总理进北京后的贴身卫士。他从里屋搬出两只箱子，指着一只铁皮的说：“这只周总理用的文件箱，我整整保存了40多年了。”

原来这只铁皮箱是我军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美国制造的陆军的军用饼干箱。当年在陕北与敌人周旋，周副主席就是用这只铁皮箱盛放文件，并加制了一个木质围框，既可让挑夫或警卫员挑着走，又可放在马背上驮。后来一直使用到西

柏坡，直到进京后才被放置一旁。

1991年的10月下旬，北京中南海内，周总理的生前秘书高振普郑重地拎出一只提包，一一清点出六件总理生前穿用过的衣物。特别是赵炜同志收藏的那身全毛花呢中山装，还是1963年，周总理出国访问前夕经邓颖超和总理本人同意才做的。周总理穿着这身衣服走南访北二十多个国家；国庆25周年招待会上，重病缠身的周总理也是穿着这身衣服参加的。总理逝世后，为了不让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毁掉这批珍贵的纪念品，他们将衣服编上号码，送往农村的亲戚家保存。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这些遗物才重返中南海。征集人员拿起一件灰色上装，一掏兜，果然掏出一张不大的白纸，上边写着一个“9”字。高振普笑着说：“9号，是总理五十年代做的派力司上装。”

征集组人员跨山越水，行程20余万里，共征集到史料照片384帧，实物及参考品152件。海内外书画名人，纷纷丹青抒怀，将一幅幅书画珍品寄往淮安。

被誉为上海“第一老人”的书画家苏局仙先生，1991年12月29日提笔为纪念馆写下了“功名盖日月，馆舍壮山河”的楹联。不料天气骤寒，老人于第二天竟以111岁的高寿溘然长逝。他对周恩来的一片敬慕之心已全部凝铸在这诗句之中了。

6月10日，纪念馆收到了海峡对岸的著名书法家高华山先生辗转赠来的一副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短短九个月内，海内外近300位书画名家向这位伟人的纪念馆一共寄来310多幅优秀作品，全部都是无偿奉献。

在纪念大厅中央，有一座巨大的周恩来塑像。这尊坐姿塑像高3.2米，基座高1.5米，总高达4.7米。

塑像石料采自北京市的房山县。采石工人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

临危不惧 指挥若定

——忆崂山遇险中的周恩来

1964年,周总理出国访问归来,途经成都,听说我在这里工作,遂派车把我接到他的住所。他老人家亲切地接见了,勉励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革命到底。并把我向在坐的李井泉同志作了介绍。邓颖超同志也亲切地询问我当年的仿情,十分关心我的生活。总理还留我吃晚饭,看电影。这次难忘的接见,又把我带回了历史上一次难忘的历险。

1937年初,“西安事变”不久,周副主席欲经西安去南京,中央保卫部门命令我们特务队第一警卫班执行护送任务。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那天,天阴沉沉的,我们警卫班的10名战士,加上带领我们的陈排长、副主席的参谋、警卫员共十五、六人,一起坐上了小型的卡车,周副主席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从延安向西安出发了。在离延安五、六十里的甘泉县境内有一个地方叫“崂山”,山势不高,但树林茂密阴森。当我们乘坐的卡车沿着山路,穿过树林,翻过小山,正进入两山之间的一段平路的时候,遭到一伙匪徒的突然袭击。敌人凭着周围山头的有利地形,仗着人多势众,用密集的火交叉射击我们的卡车。一开始司机就身负重伤,汽车停了下来。紧接着又有几个战士英勇牺牲了,情况万分危急。周副主席临危不惧,十分沉着,他指挥战士立即跳下汽车,以汽车为掩护,进行英勇地抵抗。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我们又都是带的短枪,火力单薄,情况严重。这时周副主席迅速察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右边有一个距离约百米远的开阔地带没有枪声,看来只有从那里突围了。此时,活着的就只剩下我、陈贤仁和另外一个警卫员了。周副主席果断地命令我们:“冲!”陈贤仁同志和那位警卫员保护着周副主席首先冲了出去。当时,我的腰部已负伤,但神志还清醒,腿也能活动,立即向后山坡上的敌人甩了颗手榴弹,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一下,然后也跟着冲了出去。敌人的子弹就在我们身前身后嗖嗖地飞着。我们迅速冲过开阔地,上了另一个树林茂密的山头,才脱离了敌人的伏击圈。然后又沿着一条小山沟徒步走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五十里铺。我们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周副主席立即写了一封短信找人送到三十里铺,那里有电话直通延安。当我延安骑兵和边区部队闻讯赶来时,敌人已经逃跑了。后来不久,这伙匪徒被我边区军民全部歼灭,两个匪首也被我边区政府处决。

现在,事情虽然已隔多年,但周副主席在崂山遇险中表现出的那种沉着果敢、机智灵活、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担负着国家重担。在百忙中仍然惦记着共过患难的普通一兵,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啊! ○

(赵华修整理)

小心翼翼地地下四十多米深处采制了上等石料,先在雕塑之乡河南省曲阳县粗雕,运抵淮安装好后再进行精雕。

塑像造型由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孙家彬和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姜桦两位艺术家共同设计创作。孙家彬曾参加过毛主席纪念堂内的毛主席汉白玉坐像的雕塑设计。接受任务后,两位教授反复查阅有关周总理的资料,多次看有关影像记录片。独出心裁地构思出这样一种神态:周恩来坐在一块山石上,身穿大衣,手握蓝图,双眉紧锁,正陷入深深的思考。他在思考祖国的今天还是明天?他想的是祖国的统一大业还是四化进程?他怀念着的是人民疾苦还是国家的某项建设事业?……人们用不着更多的联想,周总理还在忧国忧民!主要雕刻者河北省曲阳县的刘润发老先生已有半个多世纪的“雕龄”,他也是毛主席纪念堂内毛主席塑像的雕刻者。塑像的一点一线都在他的一锤一凿下产生,准确生动地表达了设计者的构想与境界,收到了预期的艺术效果。

在周恩来纪念馆的对面,沿着湖边有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是淮阴市中小学学生自发捐款修起来的一条表示永远怀念周爷爷的“永怀路”。旅日侨胞宋胜雄先生,九岁漂洋过海,后旅居日本,但至今没加入外籍。他家的客厅内一直挂着周恩来的大照片,他经常指着照片自豪地告诉子孙们:“他是我们中国人,是我们的淮安老乡。”他一听说家乡建周恩来纪念馆,特地赶回淮安捐赠人民币10万元,以表他的一点心意。

周恩来纪念馆总建筑面积为3265平方米,其中主馆在南,1918平方米,附馆于北,1347平方米。整个馆区全是“青白”两色,简洁而又明快,令人心驰神往,遐想无限。○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夫人志趣园合影

中山精神擎旗人

——宋庆龄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作为孙中山理想和事业的捍卫者和继承者，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密切交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在这中华民族危机时刻，宋庆龄高举中山先生旗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定地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竭诚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以其崇高的声望和特殊的身份，不畏艰险，殚精竭虑地奔走呼号，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光辉业绩。

抗战中的一面旗帜

1931年，早已对我大好河山垂涎三尺的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随后迅速占领我东三省。次年，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对我华东地区虎视眈眈。1933年，日本侵略军又吞并了我热河省。宋庆龄目睹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忧心如焚。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为了动员全国各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斗争，拯救中华民族，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对此，宋庆龄积极响应，同年4月20日，她与何香凝领衔率1779名原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联名将上述“六大纲领”以《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为题予以公开发表，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各界广大群众与海外侨胞和团体的广泛响应，公开签名赞成者达十方多人，形成了一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群众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使全国各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宋庆龄深知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武装自卫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她要求“全体人民总武装”。1934年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亲任主席，该组织在《中华民族武

• 金英豪 •

装自卫委员会为对日作战宣言》中进一步阐述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号召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该组织成立后不久就被迫停止活动,但宋庆龄建立抗日武装组织的行动,严正地表明了人民独立武装抗日的决心,这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无疑是一个挑战与沉重打击!

1935年,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欲把长城内外广大地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这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共中央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正式发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宋庆龄联合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签名响应,热诚拥护,造成了巨大社会影响。

1936年上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大量增兵,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发展迫切需要各地救国力量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组织。于是,在宋庆龄和沈钧儒、邹韬奋等的号召和组织下,于5、6月间,全国20多个省50多个救亡团体以及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代表,云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宣言”和“纲领”赞成中共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各界民众呼吁组织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亡阵线”。宋庆龄强调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目的就在于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宋庆龄被选为该会的执行委员。虽然她不是救国会名义上的主要领导人,但她却是该组织的实际领袖和带头人。她满腔热忱地关心、支持和指导救国会的工作,大大地鼓舞了救亡运动的各位领袖,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11月20日,救国会举行孙中山诞辰70周年纪念活动,宋庆龄发表了纪念词。她呼吁:“全国同胞要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①

正当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救国会的工作生气勃勃地展开之际,国民党当局竟于11月22日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宋庆龄立即以救国会招待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七君子”。12月16日,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向全国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立刻无条件恢复被捕七位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并明确提出:广大民众该有参加和组织救国团体权利,以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针对国民党当局企图压垮救国会,把全国抗日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完全纳入国民党控制的阴谋,严正声明:“救国阵线的立场始终不变,而今后也决不会变更。我们的立场是要求全国人民,不问党派,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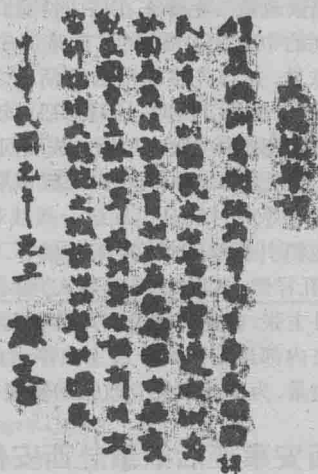
问信仰,不问地位,实行真正的精神团结,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对日抗战,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②当“七君子”在法庭内据理力争的同时,宋庆龄在法庭外发动和领导了轰动一时的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人狱运动”,终于促使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7月将“七君子”释放。这一大义凛然的斗争,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以重大的打击,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反响,为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铺垫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次国共合作“搭桥”第一人

1935年华北事变后,鉴于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和英美帝在华利益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面临严重挑战。蒋介石在加紧“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同时,也不得不寻求机会与中共接触,探讨进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于



1912年元旦,
孙中山就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时的肖像
及《誓词》。



是,蒋介石在1935年底派出大员在国内外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共产党人,以打通国共关系。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在这时约见宋庆龄,向她透露了国民党最高方面愿与中共谈判,商讨国共联合抗日的信息。宋庆龄认为蒋介石的这一意愿是符合历史潮流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与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的主张也是相一致的,便欣然同意出面斡旋。

次年1月,宋庆龄请以牧师身份在沪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带着她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赴陕北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中共中央收到宋庆龄的信后,经慎重研究,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原则: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②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③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侵略;④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⑤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这些原则,把中共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体化了。3月,董健吾携此密件返沪后亲自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又通过宋子文把上述意见转告给国民党中央。这样,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终于接通了,从此恢复了两党高层的政治接触,为国共两党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条件。宋庆龄是近十年内战后在国共之间搭起桥梁的第一人。

4月底,宋庆龄与鲁迅、茅盾、沈钧儒等会见了中共中央派回上海恢复地下工作的冯雪峰,仔细听取了他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通过这条渠道,宋庆龄与中共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

同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高度赞扬她继承孙中山革命救国之精神,并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毛泽东在信中特意介绍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批示”。同时,还请她把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介绍给潘,就建立统一战线问题进行晤谈。③宋庆龄不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殷切期望,多次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商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工作,并把他们引荐给宋子文、宋美龄等。她还多次会见宋子文、孔祥熙、吴稚晖、孙科等人,耐心说服他们接受联共抗日主张,敦促国民党当局放弃“剿共”政策,使国民党中央内部逐渐形成一股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力量,为促成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西安事变后欲亲赴西安促成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以武力扣押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及随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10余人,强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胁迫国民党政府对张、杨下达了“讨伐令”,企图挑起新的内战,以便在混战中除蒋代之。一时中国上空,战云密布,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面对严重而又复杂的局势,宋庆龄未计较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而是高瞻远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在蒋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等人的真知灼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她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准备于13日即事变后的第二天亲赴西安以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解决交通工具而未成行。宋庆龄又同潘汉年联系,约潘由沪赴宁与宋美龄会晤,商酌处理西安事变的意见。当她得知中共已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时,她坚决拥护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密切配合周恩来等和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最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在谈判结果的数项之中,宋子文、宋美龄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量办法”④。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返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宋庆龄的西安之行虽然未成,但她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尽了最大努力,而且她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影响与指导了救国会的工作,因而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领衔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为了实现团结抗日的大计,1937年初,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自由等五项要求,同时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四项保证,在政策上作出了重大让步。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由于蒋介石政治态度的某种程度上的变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宋庆龄也放弃了大革命失败后坚守的不与国民党发生政治关系的信条,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了这次全会。这一异乎寻常的行动,表明她总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宋庆龄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团结合作、一致抗日的建议,在国民党要人中积极工作,领衔联络了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向三中全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提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

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国民党:“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⑤这个提案感召了许多抗日爱国人士。为了阐明自己的政治态度,2月18日,宋庆龄在全体会上作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讲话,这一演说是要求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的说明。为了推动国民党下定抗战的决心,她首先批驳了一些政客的“恐日”病论调,剖析了日本本身存在的弱点,论证了中国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的道理。她又强调指出,只有实行先总理孙中山的遗嘱,“忠实执行他的三大政策,才可以救中国”。她严厉指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荒谬!”对此,她愤怒地发问道:“难道我们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抗日吗?”她明确指出:“救国必先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因此,她呼吁: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一切内争是可以,并且应当和平友好地解决,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我们必须赶快建立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国防。^⑥

这种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国民党多年推行的“抗日必先剿共”的误国政策,提出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去救国的主张,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是首次。它对长期坚持反共反人民、独裁卖国反动政策的国民党中央,是一次非同小可的政治冲击,对促进国民党转变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由于宋庆龄的努力和何香凝、冯玉祥、杨虎城等国民党民主派的支持以及中共及其他爱国力量的推动,最终使国民党三中全会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至此,国内和平局面基本打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热烈祝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

1937年2至8月间,国共双方代表就合作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宋庆龄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每当谈判因国民党方面设置障碍而无法继续进行时,宋庆龄总是利用各种方式、或发表谈话、撰写文章,或会见各方有关人士,敦促早日实现两党合作。

4月,宋庆龄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发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从理论上、历史上论证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并直言批评国民党反共是一个“大错误”。8月,她又在纽约《论坛与世界》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再次批评某些人过高估计日本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抗战力量的错误看法。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

口众多,在这种条件下,“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文内还着重指出:“释放蒋介石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张的。他们已尽了最大力量保持中国的团结。所以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它绝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⑦该文发表后不久,她还在上海寓所里亲自会见了赴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后到上海等待国民党方面最后答复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在倾听了周恩来对谈判情况的通报后,她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共中央提交给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希望两党的再次合作能够尽快正式建立。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英美帝在华利益和蒋介石的统治直接受到严重威胁,又由于中共谈判代表的积极斗争,加上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大力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当局终于在9月22日,责成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在两个月前就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话,从而宣告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以此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正式形成。

宋庆龄见到多年为之奔走呼号的目标得以实现,“异常地兴奋,“感动得几乎要下泪”。为此,她特地撰写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热烈地祝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文中指出:“今天在我们领土上的每个角落地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相信“我们的团结一定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克服一切的障碍。”她再次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孙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党,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拥护积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担任的国民革命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她殷切希望: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⑧

宋庆龄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她在此后抗战八年的岁月里,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生命,为了巩固和壮大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突出贡献。

宋庆龄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做出的独特的重大贡献,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

注:①②《救亡时报》1936年11月12日、12月18日。

③《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页

④《周恩来选集》第72页。

⑤《救亡时报》1937年4月15日。

⑥、⑦《宋庆龄选集》第101、117页。

⑧[《抵抗》三日刊]1937年9月26日。



乡情与乡戏

周總理三看紹劇

绍剧,又称绍兴大班、绍兴乱弹,是浙江省的主要地方剧种,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解放后,绍剧艺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60年代,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成戏曲艺术片,誉满海内外,蜚声整个戏坛。

绍剧艺术能如此大放异彩,这与周总理生前的直接关怀是分不开的。建国后,周总理曾三次观看绍剧,三次接见演员,多次作过重要指示。

• 赵玲华 • 余一苗 •

1957年一看绍剧:询问主要唱腔的来源、特点,指示要好好培养接班人。还喜爱地把小六龄童举在怀里,合影留念。

1957年1月,周恩来陪同外宾在上海参观访问。为招待外宾,上海有关部门安排了一台文艺晚会,汇报后,周恩来感到不太理想,对上海同志说,浙江有个猴戏《大闹天宫》,剧种为绍剧,可以调来。

当时,绍剧团正在萧山农村演出,黄昏接到通知,后半夜,全体人员即乘火车赶到上海。经过紧张的准备后,于第二天晚上按时演出。

大家得知周总理也在看他们的演出,既高兴,又紧张。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陪同外宾上台向绍剧团赠送了花篮,祝贺演出成功,并和演职员们一一握手,称赞说:“你们演得很好,外宾看了很满意。”他还很风趣地说:“我是绍兴人,今天第一次看到绍剧,是陈老总介绍的。”原来,两年前,陈毅同志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在杭州看过此剧,印象很深,曾向总理推荐过。演员们倍受鼓舞。周总理详细询问了绍剧的主要唱腔“二凡”、“三五七”的主要来源、特点,有什么传统唱法。演员们一点也不拘束,簇拥在周恩来的身旁,回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周总理亲切地问到几个演员的年龄。当听说一个小演员只有8岁时,他关切地说:“要好好地培养,要培养接班人。”他不无喜爱地要把这个小演员(小六龄童)抱起来,因右手吃不住力,怎么也抱不起来。旁边人急忙帮助,终把小演员抱在怀里,和大家合影留念(见题照)。临别的时候,周总理一面和大家招手,一面热情洋溢地说:“欢迎你们到北京来。”

1958年二看绍剧:坐在后台的戏板箱上与演员促膝谈心,询问演职员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演员:勤学苦练,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1958年4月底,绍剧团首次进京汇报演出。演员们与首都人民一起参加了庆祝“五一”的游行,还安排了一辆彩车,造型是“孙悟空大闹平顶山。”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邀请剧团的著名演员六龄童(章宗义)、筱昌顺等上天安门观礼台。

“五一”节后的一天下午,剧团在中国剧协礼堂演出《罚子都》、《关不住的姑娘》、《芦花记》等折子戏,周恩来又一次

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已近黄昏，在文化部长周扬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后台。他和演员们一一握手，笑着说：“我们又见面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并随和地坐在后台的戏板箱上。演员们要搬凳子给他，他摇摇手说：“不用，不用。”坐下后，周恩来说，绍剧曲调“三五七”好象有所变化，与以前有些不同。剧团同志告诉他，《罚子都》这出戏，是根据京剧剧目改编的，其唱腔与口语吸收了一些京剧传统，因此，听起来似乎有些京剧的味道。周恩来还对《关不住的姑娘》一剧中的老农民扮演者陆长胜倍加赞赏，连声说他演得不错，很有绍兴特色。

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询问了演员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当剧团党支部书记汇报到剧团已进入国营，演员们生活越来越好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好，你们要努力学习，多为工农兵演出。”他教育坐在身边的几个青年演员：“要勤学苦练，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这次谈话，周恩来建议把乐队搬到台上去，拆除音墙，让观众听得清台上演员的唱腔。并指示剧团，要注意幻灯字幕的质量，字要写得端正、清楚，以帮助观众了解剧情。他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群众观点。勉励大家要认真学习，努力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谈话结束后，演员们要求与总理拍照。周总理笑着说，已经拍过了。周扬说，大家要求再拍一张。于是，又拍了一张合影。

1961年三看绍剧：到后台箱房，告诫主要演员，你不仅自己要演好，还要好好培养后一代。有关建议，使《女吊》一剧走上新生。

1961年9月25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宣部、文化部安排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将绍剧节目也安排其中。期间，剧团正在南京演出，中央通过江苏省文联通知剧团。

剧团当时安排了鲁迅小说中描述过的《男吊》、《女吊》、《无常》三出戏，由十三龄童（王振芳）、六龄童、章艳秋等十余人组成小分队，进京参加纪念活动。

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查，最后确定《女吊》参加演出。这次演出地点在政协礼堂。演出前，周总理曾在休息室对观看演出的中央领导同志说，今天晚上请大家看绍兴大班《女吊》。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再次上台接见演员。随后，周恩来又到后台厢房，问哪一位是演《女吊》的章艳秋？当章艳秋点头回答后，周恩来鼓励她说：“你演得不错嘛，很有经验，……你不仅自己要演好，还要好好培养后一代。”并对剧团党支部书记说：“这一工作，你们一定要做好！”拍完集体照后，周总理又邀请章艳秋：“来，我与艳秋拍一张。”周恩来与绍剧女演员的照片，第二天发表在首都各报上。后来，《人民画报》、《戏剧报》都刊登了《女吊》的剧照。

周恩来对《女吊》很感兴趣。在后台，他说，女吊很有人民性，但舞台形象不够好，要美化，要把她装扮得漂亮一些。原来，当时演出时，女吊的形象是很恐怖的，穿红的衣服，黑的马夹，脸上有血，披头散发，完全是一副传说中吊死鬼的形象。自这次演出后，剧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开始把“女吊”的舞台形象逐渐美化，还吸收了歌舞、舞蹈的一些动作，较好地塑造了“女吊”这一冷酷而又美丽的复仇女性的艺术形象，得到了首都文艺界的很高评价。以后，周总理专门要求中央歌舞团来绍剧团学习《女吊》一剧。

周恩来除三次观看绍剧，对绍剧作过重要指示外，还多次把绍剧推荐给外宾及中央领导同志观看。1961年9月28日，为庆祝国庆，剧团第三次上京汇报演出。周总理知道后，决定在民族文化宫，用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招待缅甸

奈温将军。陪同奈温将军观看演出的有罗瑞卿、郭沫若等。随后，中国科学院包场观看了绍剧《龙虎斗》。结束后，郭老宴请了剧团全体人员。席间，郭老作诗《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0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次周恩来因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未能观看演出。但这次演出是周恩来出国前安排好的。毛泽东主席观看后，于11月17日写了著名的光辉诗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普及党史知识
的读物
党史纵横
赠
陈原
1961年

枯木逢春

——周总理关心满文遗产

建国之后,于1955年、1961年和1975年,国家先后开办过三个满文学习班,共培养特殊学子43名。为开发清代以来的文字、档案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一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举措正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起步并完成的。本文作者即为当时学子、今之专家,特著文存史。

满文是我国满族曾经使用过的文字。它是一种表音文字,属于阿尔泰语系。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贵族联合汉族地主官僚和蒙古王公统治全国,满语、满文被尊崇为“国语”、“国书”,在满族中大力推行,使满文不断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高峰。但是,满族毕竟是生活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许多满族人渐习汉语汉文,满语满文就逐渐衰落了,以致满族人不会说满语、不认识满文成了普遍现象。

有清一代,包括在关外时期,形成并保存下来大量用满文书写的文书,这就是满文档案。清朝皇帝为维护“国语”、“国书”的地位,也为了保密起见,要求满族大员题奏时必须用满文,而皇帝也常用满文加以批示。这些满文文书的内容多涉及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大活动和方针政策。今天保存下来的清朝满文档案,是科研人员研究清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政府机关开展工作进行查考的重要依据。据估计,我国现存清代满文档案有200万件以上,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等处,其中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收藏为最多、最重

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张玉全、李德启、鲍育万等前辈曾对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满文档案进行过初步整理和编译,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五十年代,国家档案局派人接收了南京史料征集处保存的清代档案三千多箱并运回北京。但时值建国之初,百事待举,百废待兴,来不及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只好依靠有数的几位老先生保管满文档案。1955年周总理批转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所所长、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报告,委托学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语言所举办两期满文培训班,每班正式学员4名,由蒙古族学者克敬之老先生任教。这是我国在周总理关怀下专门培养满文专业人才的开端。1960年前后,有关部门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查阅清代外交档案,发现大批重要满文档案没有人进行整理编译,发挥不了作用,遂报告了周总理。在周总理的过问下,196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开设了满文专业班,共招收北京、东北、新疆应届高中毕业生18名人校学习,同时有中央档案馆在职干部3名也入该班学习,学制5年。满文专业课由赵玉麟、涂长胜、钟棣华等先生讲授,基础课由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语言学专家马学良先生等人讲授。这样,我国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便纳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体系。该班学生中的多数人现在都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和编译工作,迄今已编译出版了一大批价值珍贵的档案史料,同时还编著或撰写了一些有影响的满语满文专著和论文,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但是,200多万件的满文档案急待整理和编译,十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197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先生(已故)给毛主席写信,说懂满文的人快没了,建议培养几个人。毛主席阅后批示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并提出意见。1973年有关部门经过调查了解,写出了《关于满文档案和现有满文人才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认为:“满文班(指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开设的满文班)毕业生可适当‘归队’(该班毕业生在1968年分配工作时大多改了行),将来还可以少量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否可由故宫直接招有一定基础的青年边工作边学习。”此事经周总理批示“拟同意”,遂由当时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改隶国家档案局,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着手筹办。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1975年9月1日这期满文干部培训班正式开学,学员20名。经过3年的学习,1978年9月该班学员结业,全部留在明清档案部工作,参加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译。如今这批年轻人均已成长起来,充实了满文专业干部队伍。

建国后,三个满文班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开办的,已经成为我国造就成一支中、青年成梯次结构的专业干部队伍。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满文档案的整理编译方面,还是在满语满文的研究方面,这支队伍已经取得了大大超过前人的成果。1990年完成出版,世界第一部《满文大辞典》,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史学界和满文学界的瞩目。

这正是总理万机无阙如,民族遗产又生辉。○